

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活动考略（1936-1947）

李 杨

提 要：通过对“全国报刊索引”“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及“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多个文献库进行重新梳理与整理，笔者对抗战时期前后在华日人反战作品的创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根据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发展特点与趋势，同时结合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可以将其存续时间大致分为4个发展阶段：1936年1月至1938年3月为黎明期；1938年4月至1941年8月为繁盛期；1941年9月至1945年8月为扩展期；1945年9月至1947年7月为转变期，开始于1936年1月鹿地亘创作的《海岸炮台》，其下限结束于1947年7月内山完造发表的《一辆悲惨的前车：失败了的日本军国主义》，前后历时11年6个月。

关键词：抗战时期；在华日人；反战文学

A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Anti-War Literature in China (1936-1947)

Li Yang

Abstract: By re-sorting and re-organizing data from multiple document libraries represented by the National Press Index, NeoHyTung, and Modern History data platform, the writer gave detailed statistics on the anti-war works written by Sino Japanese during the period surrounding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of Sino Japanese anti-war literature, and considering major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literature can roughly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dawn stage from January 1936 to March 1938; the peak stage from April 1938 to August 1941; the expansion stage from September 1941 to August 1945; and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September 1945 to July 1947. Such writing emerged when Seacoast Gun by Kaji Wataru came out in January 1936 and ended when A Miserable Lesson: the Failed Japanese Militarism by Uchiyama Kanzo was published in July 1947, lasting 11 years and 6 months.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Sino Japanese, anti-war literature

引言

“在华日本反战文学”这一概念最早由东北师范大学的吕元明教授提出。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研究日本反战文学的权威学者，吕元明将其发表的《从战俘产生的日本反战文学》及《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文学》等文章进行整理，于1993年出版了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抗战时期诞生于中国的日本反战文学。吕元明盛赞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是“日本战争年代最进步、最富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1]。但时至今日，中日两国学界针对“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的存续时间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笔者历时三年之久，对民国时期各大报刊上发表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作品进行详细整理与编目。统计结果表明，抗战前后发表在民国主流刊物上的日本反战文学作品数量约有340余篇，其中有名可考的日人创作者也多达60余人。这些反战文学作品不仅拓展了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反战文学的高度与宽度，也表现出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觉性与实践性。在华日本反战文学不仅数量众多，且部分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因而本文试图在吕元明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再度发掘，并尝试对“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的发生时间进行学术界定。

一、黎明期（1936.01-1938.03）——从“鹿地来华”到“异域重生”

抗战时期在华日本反战文学肇始于鹿

地亘的来华，正是在鹿地亘为代表的在华日本作家的努力下，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才得以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在日本几近消逝的普罗反战文学才得以在中国实现“异域重生”。1935年11月，出狱后的鹿地亘已无法在日本开展革命文艺工作。实际上在鹿地亘坐牢期间，日本共产党便已经濒于崩溃的境地，连其机关刊物《赤旗》也被迫停刊。出狱后的鹿地亘所见之日本乃是法西斯主义越发猖獗的日本，曾经的革命同志们也纷纷选择缄口不言，“整个社会完全被涂成一种单调的颜色”^[2]。关于其前来中国的缘由，鹿地亘写道：“我并不知道能去中国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中国此刻正面临着日本的侵略，正在燃起民族解放和抗日的烽火。因此我希望至少也能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尽一份力。”^[3]诸多缘由之下，鹿地亘最终选择前往中国继续开展文艺革命工作。

根据鹿地亘的记载，他本人是1936年1月15日伪装成演员从神户出发离开日本的。^[4]据笔者考证，1930年代日本神户港往返中国青岛港的轮船公司仅有日本邮船会社、原田汽船会社及大阪商船会社。根据《满洲支那交通便览》记载的日本-青岛之间的航路显示，从神户到青岛需要5天时间。^[5]可以确定，鹿地亘是1月15日下午登船离开的日本，后于19日下午后到达的青岛。鹿地亘在青岛期间创作了来华的第一篇反战文学作品——《海岸炮台》。但由于鹿地亘初到中国，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该作品直到当年12月才在施谊与姬明共译后，最终发表在《光明》杂志第2卷第1期上。本文在此选择将“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的发生上限设定为1月鹿地亘完成该作品之时，因而1936年1月便是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开始的时间。

1936年1月21日，鹿地亘从青岛出发奔赴上海。在上海期间，经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介绍，陆续结识了胡风、夏衍、郑伯奇、沈起予以及萧军等一干革命文人。鹿地亘在鲁迅的建议下，不仅从事文化工作，还尽量与中国的实业家及学生等群体进行接触。通过与中国人的交往，鹿地亘“逐渐了解到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和面临自卫战争的中国人的心情”^[6]。在上海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鹿地亘对于中国的革命则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正是这种不同于在日本时期的真实体验才促使鹿地亘的革命文艺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鲁迅去世后，鹿地亘前后写了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分别是：《惜别鲁迅》《鲁迅·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插曲》《怀念鲁迅》《与鲁迅在一起》《鲁迅和我》及《鲁迅的回忆》，其中《鲁迅和我》还被刊登在《中央公论》的第51期12号上。其后，鹿地亘还发表了《萧军小传》（《文艺》5期7号，1937年7月）及《夏衍小传》（《文艺》5期9号，1937年9月）等介绍中国左翼文人的文章。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鹿地亘夫妇在上海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日军占领上海后开始通缉鹿地亘，沦陷后的上海处处充满危机。鹿地亘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述道：“我们每天要为我们的性命担忧，因为我们已经好几次听到说有人要暗杀我们。”^[7]于是鹿地亘夫妇在英国友人路易·艾黎氏的帮助下，得到了2张船票。夫妇二人最终得以于11月27日^[8]离开上海，并于12月1日到达香港。一路同行的还有绿川英子、何香凝、郭沫若及邹韬奋等人。在香港期间，尽管鹿地亘夫妇生活一度难以维持，但鹿地亘依然继续从事着反战言论活动。1937年12月，鹿地亘创

作了《现实的正义》和《所谓“国民的公意”》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夏衍将《现实的正义》翻译后，分别于1938年1月31日和2月8日刊载在《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上。鹿地亘在文中写道：

“我爱的祖国，我那充满了民众的嗟伤和愤怒的祖国，一切都变化了。以前在压迫下，祖国的‘文化’也不断地传达出民众的愤怒，但现在她已经被狂怒的侵略者的代言人霸占了……日本‘文化’已在狱中。”^[9]连楼适夷也赞叹鹿地亘是“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正义的战士，日本万千被压迫民众的代言者”^[10]。在香港避难近4个月之后，在陈诚的邀请下，鹿地夫妇于1938年3月18日乘火车离开香港^[11]，并于3月23日到达武昌，从而开启了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的第二个阶段。

总体来看，这段时期属于鹿地亘在华早期文学创作阶段，也是其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鹿地亘夫妇，生活上颠沛流离，经济上阮囊羞涩，在东躲西藏的艰苦环境中从事着反战文学创作。但也正是在上海及香港旅居的这段时间，鹿地亘得以结识了许多中国文人，并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同时正是在鹿地亘夫妇的坚守下，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才能重燃焰火，实现“异域重生”，并最终大放光彩。

二、繁盛期（1938.04-1941.08）——从“个别创作”到“群体创作”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郭沫若、周恩来、陈铭枢及鹿地亘等三百余人参加此次大会。大会次日，鹿地亘作致辞，并由胡风充当翻译，鹿地在提到中日战争当下情势时指

出：“日本现在万难分配重兵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如日本集全国力量侵略中国，则中国人民必起而攻击日本军阀，且中国正向着世界民主国家大路走，是日本侵略中国，决难悻胜。”^[12]鹿地的到来，给不少中国文人带来了一丝震撼。实际上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另外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协中的党员作家，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文艺活动。^[13]鹿地亘夫妇抵达武汉后不久，武汉市各界为其召开了欢迎晚会，沈钧儒、田汉以及郭沫若等一众名流皆为其接风洗尘。国内外不少记者对鹿地亘夫妇进行了采访，有记者盛赞“鹿地亘是日本最先进的著名作家”^[14]。

鹿地亘夫妇的加入，受到了夏衍、冯乃超以及田汉等人士的欢迎，甚至连李宗仁也在4月9日发来电报对鹿地亘夫妇表示感谢。但实际上，虽然国民政府政治部给了鹿地亘夫妇设计委员的名义，而且也有第三厅管他们的工作，但却没有给他们业务性的工作，只要他们公开表态，向外国来宾和记者谈话，这就算是做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工作。^[15]但鹿地亘显然不希望看到自己只是充当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工具人与门面而已，而是真真切切地希望站在中国人的一边从事抗战运动。在寄给夏衍的信中，鹿地亘描述了来汉后短短十来天的见闻，并诚恳地表示“将要抬头挺胸起来，不单是以‘鹿地’，而是要以‘日本人民’的名义，自此以后，我将作为日本民众的代表，一直拼命地战斗下去。”^[16]但鹿地亘自己也清楚仅凭自己一人是很难成事的，为此他需要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也正是他后来组建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而此事的契机很快便到来了。4月15日，第三厅冯乃超安排邢桐华前往鹿地亘

处，并就将来俘虏教育的政策进行了意见交换，并很快做成了报告。自此以后，鹿地亘便开启了教育日军俘虏成立反战组织进行反战的道路。鹿地亘本人也认为“通过俘虏教育，在他们之间自发的形成反帝国主义运动是充分可能的”^[17]。

1938年6月11日，武汉会战爆发。为保卫武汉这座华中重镇，以鹿地亘为代表的在华日本作家们创作了一系列支援中国抗战、反对日本侵略的文学作品。鹿地亘曾写下《保卫武汉》一诗，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中国军队守卫武汉的支持及鼓励。该诗由冯乃超翻译后发表在《新时代（武汉）》第1期。在武汉会战期间，鹿地亘陆续发表了《给中国少年诸君》《到抗战的队伍中去》及《告日本人民》等反战作品。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也发表了《我们要战》《武汉行》及《西崽的故事》等文章。鹿地亘夫妇在武汉的反战宣传活动，极大地鼓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另外此期间同样在武汉从事反战宣传的绿川英子也发表了《爱与憎》《日本朋友慰劳信》及《纪念九一八：告故国的同胞》等反战文章。对于绿川英子大无畏的国际精神，龚佩康赞扬道：“绿川像热爱日本一样热爱中国，她怀着一颗灼热的心，要奔赴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她反对侵华战争，主张中日人民和平相处……”^[18]

另外自抗战以来，随着各地日军俘虏的逐渐增多，国民党军政部分别在长沙、桂林、西安等地成立了“俘虏收容所”。受到反战教育而觉醒的日军俘虏也逐渐加入反战阵营，他们有的在后方从事文艺反战活动，有的在前线从事反战宣传活动。在鹿地亘的努力下，1939年12月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这意味着从此日人

在华反战文学的创作开始由个人活动阶段开始进入到组织活动阶段。与个人单打独斗的个别作者创作相比，有组织的集体的创作使得在华日本反战文学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更胜以往，在华日人反战文学创作开始进行繁盛期。经过思想教育而觉醒的日本俘虏们发表了不少反省忏悔的文章。如森下九郎写下《告日本民众书》及《敌军反战文书：被感化后之感想》，中山泰德写下《敌军横行的武汉》《鄂东战斗回忆录》《我的日本革命观》及《打倒暴戾的军阀财阀》等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5月由冰心在西安主编的《黄河》杂志第2卷第4期上还刊载“日本反战同志文艺专号”，其中有14篇均为日本战俘的反战作品。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国统区的日人反战活动开始受到巨大影响。从国内来看，随着抗战开始进入到相持阶段，由于战线的逐步扩大，日本国力吃紧，无力进一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日本开始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策略。国民党亲日派势力抬头，并制造反共摩擦事件。鹿地亘面对此形势，忧心忡忡道：“中国抗战发生重大变故，乌云密布，遮天蔽日。对抗战前途失掉信心的政府上层人士私下里盼望着能够与日本达成妥协，抗战派和支持抗战的民众则被其视为累赘。”^[19]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的存在，极大限制了鹿地亘的反战活动。由于担心鹿地亘与延安方面过于密切，国民党当局甚至阻挠鹿地亘与延安的日人反战组织取得联系。1940年5月8日，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剧团在重庆上演反战剧《三兄弟》之际，遭到国民党的干涉，何应钦以“反战话剧给中国将士以恶劣影响”为由，下令终止了《三兄弟》的所有演出。^[20]随后不久的8月，蒋介石更是下令撤销了第三厅，同时逼迫第三厅的

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下令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此举严重破坏了国共合作的民族抗战基调。由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远在桂林的夏衍及胡风等人也不得不逃亡香港，皖南事变的爆发甚至也影响了反战同盟。3月16日，反战同盟部分成员受到国民党邹任之及王芄生等顽固派的挑唆，成仓进等8名成员趁机出逃。俘虏逃亡事件的发生给了国民党顽固派以借口，事后鹿地亘和反战同盟事后受到了国民政府的严厉处分。7月，反战同盟机关刊物《人民之友》及《真理的斗争》被迫停刊。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下令“解散”反战同盟，反战同盟的全部成员均被移送至贵州省镇远军事委员会第二战俘收容所。自此以后，国统区刚有起色的日人反战运动受到极大限制。

这一阶段，由于国民政府的邀请，鹿地亘、绿川英子及青山和夫等在华日人反战活动有了中国官方的支持，再加上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成立，在华日人反战文学创作进入繁盛期。但由于皖南事变的爆发，国统区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活动开始受到压制，创作重心逐渐由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扩展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

三、扩展期（1941.09-1945.08）——从“白区萧瑟”到“红区火热”

1941年9月4日，在郭沫若的劝说下，张治中批准在政治部内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鹿地研究室”。除了鹿地亘夫妇外，还有“文工会”派来的康天顺及一名日本人助手。井上桂子认为，自此以后国统区的日本人反战运动分为了重庆“鹿地

研究室”活动及镇远第二收容所“和平村”训练班两大部分。笔者认为，除了这两部分外，重庆的“青山和夫研究室”也同样是一部分。虽然青山和夫其人混迹于国民党内部，与王芃生沆瀣一气，有着种种敌视鹿地亘的行为。但作为抗战时期在华从事反战活动的日本人，需要客观看待青山和夫的反战成绩。因而在该阶段，国统区从事反战文学活动中心的实际上分为三个部分。另外在此阶段，由于野坂参三的来华及解放区日人反战组织的相继成立，解放区的日本反战文学也开始得以蓬勃发展起来。此阶段的整体特征是，一方面国统区反战日本文学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但另一方面解放区日本反战文学反而在规模及数量上有了巨大突破。

1. 国统区日本反战文学

这一阶段鹿地亘主要在重庆活动，并对康天顺在镇远开展的战俘教育工作进行远距离指导。康天顺于1942年6月受郭沫若及冯乃超任命被派往镇远和平村从事日俘教育工作。在镇远期间，康天顺受鹿地亘远程指导，并与其频繁保持信件联系。根据笔者对《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统计，康天顺在镇远的18个月期间曾给鹿地亘寄送过37封信件，平均每月2封。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的抗战体制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鹿地亘在华反战活动也开始受到英美国家的关注，从而为鹿地亘的反战活动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这期间鹿地亘相继发表了《废园的小鸟》《小林多喜二死难日记录》《与苏联一同》《远东侵略战争与日本人民革命》《什么叫做交易》及《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经济侵略政策的特征》等作品，还出版了《和平村记》《我们七个人》与《寄自火线的信》等反战专著。

同一时期，青山和夫及其“青山和夫研究室”也开始发挥一定程度上的反战宣传作用。与作为作家的鹿地亘相比，青山和夫的文章更多以政论文的形式出现，作品多以研究日本政治及军事政策为主。青山和夫在此期间相继发表了《日本财政经济的破绽与军政内阁》《美日战争特辑：太平洋战与日本财政》《旅美日侨一枝反日的队伍》《战时日本经济动态：战争中的日本经济恐慌》《认清日本的企图》《太平洋战争与日本财政》《迎“台湾日”》《祝朝鲜“三·一”革命纪念》《日本之过去现在将来》《打到日本天皇》《对于日本天皇的看法》及《日本战败与战后问题》等文章，其内容主要围绕批判日本天皇及军政内阁为主。

作为在华为数不多的日本女性反战活动家，绿川英子的作品相对而言文学气息更为浓厚，并且更加关注战争与妇女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绿川英子相继发表了《一个风暴雨时代的诗人》《黎明的合唱》为国际青年节题词》《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弟兄们，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目前日本妇女的生活》《没有花的庄稼人》《解放是要争取的》《志愿囚徒》《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妇女》《在战斗的中国：暮春的离别》及《人间地狱日本矿工底生活》等文章。

反战同盟被国民党解散后，作为“战俘”的反战盟员的反战文艺创作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主流报刊上已经难见其相关反战作品发表。尤其是《人民之友》和《真理的斗争》被迫停刊后，反战盟员一度缺乏反战文艺战斗阵地。一直到康天顺前往镇远和平村开展工作后，反战盟员们才得以有机会再度开展文学反战斗争，并坚持在《东亚先锋》及《和平先锋》上发

表反战文学作品。与鹿地亘及绿川英子等文人型创作者不同的是，士兵型创作者作品类型与题材更加丰富。如长谷川敏三的《战斗的一年》、城崎胜马的《从奴役跃起的朝鲜民主》及《长期战争下冲绳县民的穷状》、广濑彻的《战争失败即为人民的胜利》、草野敏雄的《日本国民反战斗争的任务》及秋山龙一的《日本的劳动阶级请做好今年五一战斗的准备！》等等。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政策，战俘们的公开文学创作受到很大的压制。

2. 解放区日本反战文学

与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相比，地处西北的延安及各根据地由于经济条件恶劣，物质条件艰苦，导致文学活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管是报刊的发行还是杂志的发行，在数量上远不能与重庆相比。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宽大的俘虏优待政策以及对在华日人反战事业的鼎力支持，在抗战爆发后，延安及其各抗日根据地诞生了一批日人反战组织。这些反战组织不仅在前线开展反战宣传活动，还积极从事各种反战文艺活动。与国统区相比，解放区的日本反战文学诞生较晚。其原因总得来讲，是由于根据地早期缺乏像鹿地亘及绿川英子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领导。就笔者搜集史料情况来看，解放区最早的日人反战作品为日俘井上晴雄于1938年12月17日在《抗敌报》上发表的《我的感想》一文。

1940年3月，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秘密前往延安后，根据地日人反战文艺活动开始得以迅速发展起来。野坂参三匿名在中共总政治部发行的《帝国资料》上发表题为《日本革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一文，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篇文章指出了日本共产党人在战时形势下的任务，后

来这篇文章还被印刷成小册子，并在华北的日本士兵和日侨中秘密散发。^[21]1940年5月，野坂参三指导在延的日本同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与鹿地亘在重庆的日人反战总部遥相呼应。1941年5月，又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其后随着各根据地日人反战组织的壮大，解放区日人反战活动开始进入活跃期。各根据地日人组织还纷纷创办日文反战期刊，积极发表反战文章，进行反战宣传。在解放区，野坂参三发挥着类似鹿地亘在国统区的核心领导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后，解放区日人反战文学创作便有了更好的官方发表途径。反战同盟成员和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相继发表各种反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东忠发表了《反战斗争的一周年》、大谷正发表了《我的转变》、大山光美发表了《我们十四个日本人怎样到延安的》、谷川发表了《“皇军”不愿意打仗了》及《现代的日本军队》、小林武夫发表了《两年来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山川助藤发表了《战争开始的回忆》、蓑羽亮吉发表了《一位日本俘虏的故事》、大西正发表了《反战斗争前线的战士》、秋山良照发表了《悼黑田嗣彦同志之死》、小岛金之助发表了《岩崎一等兵的新生》、渡边俊夫发表了《我的中国朋友》、滨田真实发表了《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原清志发表了《秘密文件与娃娃》等。此外，解放区各日人反战组织创办的日文报刊也刊载了相当数量的反战文学作品。如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创办的《战友》、《日军之友》及《前进》，觉醒联盟太行支部的《觉醒》《反战》及《报道新闻》，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的《士兵的

呼声》及《黎明》等等。

这一阶段，从创作数量来看，解放区日人创办的日文反战刊物多达二十余种，远多于国统区；从活动区域来看，解放区日人反战文学活动涉及延安、太行、晋察冀、冀中、鲁南及苏北等地，活动范围几乎涵盖了大部分解放区。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该阶段在华日本文学活动的中心由国统区扩展至解放区，并且解放区的日人反战文学创作更为活跃与丰富。

四、转变期（1945.09-1947.07）——从“反对战争”到“和平民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并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虽然在政治上结束了“侵略战争”，并不意味着“反战文学”的即刻终结。因为虽然日本法西斯在军事上与政治上投降了，但却并不意味着日本就能立刻建立起民主的政权。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研究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应当把它放在产生它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并且顾及它与上下左右前后诸事物的联系。“日本在华反战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学现象，诞生于日本侵华时期，从广义上来讲，它所担负的文学责任不仅仅只是“停止侵略战争”，还要求“建设和平民主”的新日本。而8月15日，只是实现了前者目标而已，因而此时“日本在华反战文学”的发展过程尚未完结，只是由一个阶段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战后的日本，距离民主还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在华日本作家还未即刻归国，这就决定着“在华日本反战文学”还将继续进行。

1945年9月，绿川英子在《新华日

报》上发表《在歧路上的日本》一文，并强调要永久剔除日本法西斯势力。10月21日，鹿地亘、青山和夫及盐见圣策等12名在渝日本人在中苏文化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在场的除了军政部吴石参事外，还有新闻界人士等19人。盐见圣策说道：“来渝多年，吾等均为日本革命势力，今军阀倒台，日本苏生，应多联系，以期建立民主之日本。”^[22]实际上，从盐见胜策的话也可以看出，日本战败后，日本的革命任务也有所变化，这也导致在华日本反战文学产生了新的转变，标志着反战文学的主题由“反对战争”到“和平民主”的转变。

关于战后青山和夫的去向，媒体也有所记载。1945年12月25日《大公报（重庆）》记载：“日本革命志士青山和夫，在中国工作八年，于本月二十三日离渝东归。”^[23]1946年1月19日《益世报（重庆版）》记载：“反战作家青山和夫，前由渝抵汉，此行系返国参加改进日本事业工作，抵汉后分访此间日籍旧友，并赴日德侨民管理处演讲。兹悉，青山定于本月十八日启程赴沪云。”^[24]根据《时事新报（重庆）》记载，青山和夫是1946年3月底抵达东京的。^[25]青山和夫归国之前，《大公报（上海）》与《大公报（重庆）》分为在3月17日以及3月24日刊载了《现阶段日本政治动向》一文。这也是在华期间，青山和夫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归国后的青山和夫参加了山川均组织的“民主人民联盟”，并从东京寄来稿件《日本的民主运动》发表在6月30日的《大公报（上海）》上，自此以后青山和夫再也未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任何文章。

1946年3月13日^[26]下午，重庆的二十一个文化团体三百余人在西南实业大

厦举行“欢送鹿地夫妻和反战同志归国”宴会。东方文化协会主席郭春涛致词称：“鹿地等在华忍受物质生活艰苦，以至衣服破烂，无法添置，不以为意，八年来专心工作如一日，举凡上述均出于对人类崇高之爱及对民主前途信心所致，实事求是钦佩。”^[27]其后，郭沫若与田汉分别发言，冯乃超还草就长篇散文一篇予以赠送。青年联谊会呈献锦旗一面，上书“反对法西斯使我们携起手来，竞取民主永远结合”。3月14日下午，张治中也在政治部设宴为鹿地亘夫妇送行，副部长袁守谦及黄少谷对鹿地亘数年来在华参加反侵略战争及对敌宣传工作的贡献致以感谢。3月14日，《新华日报》刊载了鹿地亘发表的《临别赠言》，这也成为了鹿地亘在华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鹿地亘夫妇原计划3月13日乘飞机前往上海，因故延期至18日才到上海，并在上海滞留一个多月。4月29日，《大公报》记者戈衍棣前往拜访了鹿地亘，两人从鹿地亘在华抗日一直谈到鲁迅。在谈及归国后的计划时，鹿地亘回答道：“我回去绝不参加任何政党，我还是做我的文化工作。我希望以我超政党的人民的地位，促进各进步党派的合作。”^[28]1946年4月30日，鹿地亘夫妇离开上海返回了阔别十年之久的日本。鹿地亘在华长达十年的反战活动，也备受我国人民的尊重。有媒体发文称：“日本有两个革命领袖，在抗战期间，曾经对我国抗战很有贡献，一个是在重庆的鹿地亘，一个就是在延安的冈野进。鹿地亘是一个民主派的作家，八年来，他为了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在我国的大后方的确是与我军民共尝了辛苦。”^[29]

另外，日本投降之后，远在上海的内山完造书店被国民政府没收，内山完造

作为日本人与其他上海日侨一起被集中管理。滞留上海日侨及日军战俘人心浮动，担忧未来。内山完造受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的委托，对日侨及战俘开展生活讲座。当时与其一起担任宣传工作的日方人员还有广濑康太郎、星野芳树、塚本助太郎等10人。当时日侨管理处的宣导科还曾一度发行半月刊《导报》。该刊物的目的在于引导日侨中的先觉分子摆脱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迷信，使日本成为民主国家。不少滞留上海的日人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如内山完造的《胜败》及《抗战须》、德川永子的诗歌《献给后一代》、河野樱花的《日本人的姿态：从香港到上海》、上村寿男的《战败后经济的出路》、小竹文夫的《东亚的反省》等文章。这类文章大多表现了在沪日侨对日本今后和平民主发展的展望。

1947年7月1日，内山完造在《远风》发表了《在六三园》，回忆了1935年日本诗人野口米郎经过上海时与鲁迅会面的情景。随后在10日，内山完造又在《学风》（上海）上发表了在华的最后一篇文章《一辆悲惨的前车：失败了的日本军国主义》。这篇文章也成为内山完造归国前在华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同时也为长达11年6个月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史画上了休止符。由于内山完造与郭沫若、田汉等人士走得过于亲近，至12月国民党政府以内山完造是“颠覆国民政府阴谋集团”主谋，向内山完造等33名日本人下强制归国命令。12月8日，内山完造被强行遣返回国，由此结束了其长达30多年的旅华生涯。

这一时期，以日本投降为分界线，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创作的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创作者主要以战后齐聚上海的日侨作家为主，他们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文化

水平较高，大多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持批评态度，所写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战争的反省，但主要以展望日本将来的和平发展为主。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活跃在中日友好事业的前线。

结论

“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他的诞生与日本侵华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紧密相连，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如果说中国的抗战文艺肩负着以文艺为武器教育群众和动员群众的伟大使命，那么日本的在华反战文艺则肩负着以文艺为武器“唤醒”受法西斯思

想戕害的日本大众来反抗法西斯黑暗统治的历史重担。在华日本反战文学诞生于特殊的时空与地域，严格上来说，他是不成熟的文学，自1936年至1947年的短短的11年时间也不足以让其达到“文学运动”这一高度。另外由于这些文学创作在地域上呈现出分散性，创作者还要在艰苦的创作环境中坚持前线对敌斗争，这一切都加大了反战作品文学性的提高难度。在战争年代，在华日本作家们发表的许多文章已经遗失，其中大部分作品已不可考，这不得不说是日本反战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但幸运的是，遗存下来的资料依然为后来者留有尚可挖掘的丰富文学矿藏，这也是今后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宝贵文学资料。

注释：

- [1] 吕元明. 《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 [2] 鹿地亘. 『中国の十年』、時事通信社、1948年、第6頁。
- [3] 鹿地亘. 『中国の十年』、時事通信社、1948年、第6-7頁。
- [4] 鹿地亘. 『中国の十年』、時事通信社、1948年、第3頁。
- [5]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大連管理局營業課 編. 『滿州支那交通便覽』、1920年、第47頁。
- [6] 井上桂子. 《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 [7] 陈士丹译. 《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作家—鹿地亘》，《国际周报》，1938年12月25日，第35期。
- [8] 笔者注：关于鹿地亘离开上海时间众说纷纭，如井上桂子记载为11月27日，孙金科记载为12月1日，而根据鹿地本人记载为11月25日。笔者在龚佩康的《绿色的五月—纪念绿川英子》找到绿川英子夫妻离沪时间正是11月27日，综合考量本文在此采信井上桂子的考证时间。参考鹿地亘. 『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下卷、同成社、1962年、第395頁。
- [9] 鹿地亘，夏衍译. 《现实的正义—“日本文化在牢狱中”》，《新华日报》，1938年2月8日。
- [10] 适夷. 《欢迎我们的日本友人》，《新华日报》，1938年2月8日。
- [11] 鹿地亘. 『抗戦日記』、九州評論社、1948年、第9頁。
- [12] 《全国文艺界抗敌会昨晨正式成立》，《申报》，1938年3月28日。
- [13] 戴知贤；李良志.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 [14]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素描》，《孤岛》，1938年，第1卷第7期。
- [15] 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90页。
- [16] 鹿地亘.『抗戰日記』、九州評論社、1948年、第22-23頁。
- [17] 鹿地亘.『抗戰日記』、九州評論社、1948年、第27頁。
- [18] 龚佩康编译.《绿色的五月—纪念绿川英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6页。
- [19] 鹿地亘.『火の如く風の如く』、講談社、1959年、第36頁。
- [20] 鹿地亘.『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上、同成社、1962年、第136頁。
- [21]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野坂参三选集 战时篇》，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11页。
- [22] 《青山和夫等昨开座谈会》，《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10月22日，第2版。
- [23] 《青山和夫离渝东归》，《大公报（重庆）》，1945年12月25日，第2版。
- [24] 《青山和夫昨离汉赴沪》，《益世报（重庆版）》，1946年1月19日，第2版。
- [25] 《鹿地亘夫妇已安抵沪》，《时事新报（重庆）》，1946年4月8日，第3版。
- [26] 笔者注：关于欢送会的举办时间，鹿地本人记载为3月17日，笔者认为鹿地本人记忆有误。根据《新华日报》及《世界晨报》等报刊记载，欢送会举办时间为3月13日。本文在此采用民国媒体的报道时间。参考鹿地亘.『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下卷、同成社、1962年、第409頁。
- [27] 《欢送鹿地亘返国》，《世界晨报》，1946年3月17日，第1版。
- [28] 戈衍棣.《送鹿地亘归国》，《大公报（上海）》，1946年5月1日。
- [29] 花如梦.《中国之友：鹿地亘和冈野进》，《海潮周报》，1946年，第35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17ZDA284）阶段性研究成果，林敏洁为本稿通讯作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